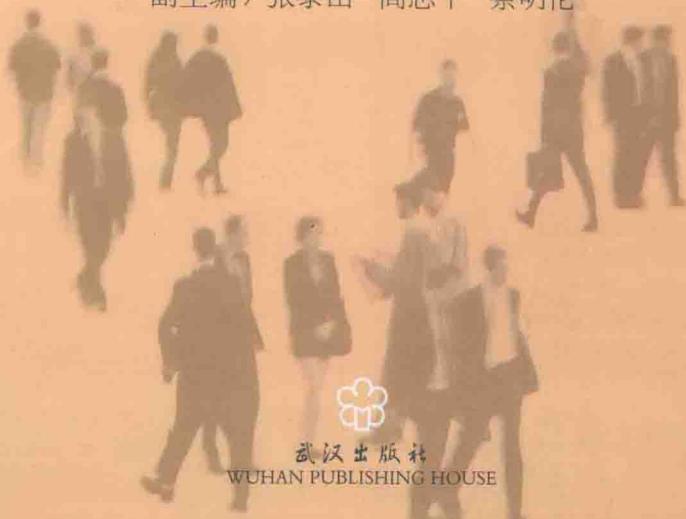


转型中的 Zhuaxingzhong De

世界与中国 Shijie Yu Zhongguo

主编／徐旭阳 徐 煒

副主编／张泰山 高志平 蔡明伦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本书得到湖北师范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转型中的 Zhuanxingzhong De 世界与中国 Shijie Yu Zhongguo

主编／徐旭阳 徐 煜
副主编／张泰山 高志平 蔡明伦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中的世界与中国/徐旭阳,徐煜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2

ISBN 978—7—5430—4048—9

I . 转… II . ①徐… ②徐… III . 社会发展—研究—世界

IV . D5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530 号

主 编:徐旭阳 徐 煜

责任编辑:雷方家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2.875 字 数:333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是湖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师近几年来在中西社会转型领域的研究成果。全书根据社会转型这一课题的内在联系和分工,分为三个研究方向:社会转型理论和西方社会转型;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转型;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三个方向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社会转型研究的整个体系。这些研究成果有些已在国家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代表着当时这一领域的较高研究水平,大部分是教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属首次发表。无论是哪类文章,也无论其学术水平如何,都是教师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成果,也代表着湖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的科研方向和科研水平。

主编简介

徐旭阳，男，1964年8月生，湖北省浠水县人，历史学博士，湖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985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1997年7月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3年7月获苏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先后主持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教育厅研究课题4项，2007年7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42万字专著《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在《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历史档案》、《江汉论坛》、《贵州文史丛刊》、《安徽史学》、《文史杂志》、《北方论丛》、《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共发表论文40余篇，多项成果获黄石市和湖北师范学院科研成果奖。

徐 煜，男，1964年4月生，湖北省黄梅县人，历史学博士，湖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会员、中国英国史学会会员、《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95年和2003年分别获得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西方主要国家现代化进程和20世纪英美经济关系。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湖北省教育厅项目4项、校级科研项目3项，在《武汉大学学报》、《民国档案》、《历史教学问题》、《学术论坛》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数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先后获第3届黄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第4届黄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序 言

历史学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虽然基于已经发生的过去，但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对社会事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同时，却都与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紧密关联，甚至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历史学；这其中，不仅因为历史学在内容上包罗万象，呈现出其研究领域、方法的综合性、多样性，同时，历史学另外的特点还在于，它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关注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纵深变动及对整体文明的未来趋势发展。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理解史学的意义和抱负时慨然提出了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接近于史学的根本旨趣。

古往今来，凡优秀的历史学家都自觉地被其所经历到、观察到的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所吸引，尤其是那些历史上的重大变动时期。对这些被后人称之为“变革期”的历史阶段的研究，能揭示历史在古与今中的联系，更能深刻领会当下的文明处境，也自然能最有价值的揣测我们对未来的好奇心和责任心。人类文明经历过很多重大的变革时期，其中与我们今日生活联系、影响最深的便是工业革命所带来整个全球社会的变化。“现代”一词，便由此而来。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对工业革命前后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析、概括都不尽相同，但如果排除过于狭隘的一元性的历史观，仅以此划分为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大多人还是接受这一认识的。

由于中国旧的农耕文明历史悠久，人口多、国情复杂，其用近代工业文明改造自身的历程较短且不乏艰辛、曲折，今日仍处于“转型”中。事实上，中国学术中的史学也始终伴随这一进程，处

于其中的史学家一直置于“转型”的焦虑和语境中。自晚清以来，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把中国自身问题的思考置于新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潮流的世界背景之下，所以作为中国本土的历史学研究，不仅是世界史，还包括中国史在内多不能脱离中国发展中的“现代化”或“转型”的现实关怀。而世界史研究中最为关注的便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实“转型”无疑提供着更深刻、更直接的教训和经验，即使是本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思潮也是基于“现代”对照下的“传统”一面的反思，是探讨“转型”和“变迁”的潜在的历史制约因素。

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对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兴起展现了人们对人类社会认识、把握的前所未有的信心，对于人类社会，人文学者也可以像科学家观察和研究物理世界一样去获得社会运动的谜底，演绎的方法、概念的提出、社会模式的描述、社会理论的构建，更具有“科学”特征的各种社会学说、观念随之发展而来。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是由西方发轫而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最先关注、研究了这一深刻变化的由来和前后时代巨大差别，他们用理性主义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这一变革，如社会形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前者影响之深的马克思·韦伯的“类型学”分析在社会学历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这一学术传统深深影响了后来社会学风行的美国学术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思潮，就是充分吸收了社会学研究成果，从而对世界范围内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未来进行描述、分析，“现代化”甚至常常转换成意识形态的语言，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念和价值观念，播行于全球。

作为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也存在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中国旧式的史学研究往复纠缠于考据与义理之间，汉学与宋学轮流称大，学术无法寄托于能够辨伪的机制上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在近代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和贡献,就在于在社会历史研究中重视分析和社会分析理论的创新,无论是20世纪早期的社会性质论战,还是封建社会分期及由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性等问题转化而来的“传统——现代”范式下的中国史研究,都能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关注重大变革阶段,努力借鉴各种社会分析理论工具进行史学研究的路向。虽然,机械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论和对马克思社会学说的理解教条化,使得中国史学经历了不少曲折,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系列概念及对社会形态模式的构建,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方法和工具。因为在传统的考据和义理之外,我们还需要对古往今来的整个人类社会进行更为精密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的结构、运行的机制,科学认识其规律,服务于更为自觉的人类创造活动。在经历了“文革”后,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借鉴吸取新的社会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新的活跃期,系统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被积极地尝试于史学研究中,这些学说被广泛的用来纠正或补充有关社会模式和特征已有的认识,虽然在有些具体观点上与以往旧的唯物史观研究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在分析工具上,都延续了中国学术近代化以来重视社会理论分析的传统;尤其是目前通常理解的“传统——现代”的现代化转型及现代化研究思潮,其本身就是受到欧美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现代化理论赋予了现代社会种种模式化的描述,关于“变革”的表述纷纷被看似更为精确、精致,更为系统化的“转型”所取代。这反映了史学永远关注当代的现实品格,同时,也是对中国史学在学术现代化上的自觉追求。

虽然,狭义上的“转型”多指人类文明史上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兴起前后的社会变动,对这一“转型”的研究,现实意义更为直接甚至重大,但是,对于“转型”两面的“传统”与“现代”的认识却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不仅需要严谨、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启示宏观上的思考,同时还要细致研究处于“传统”和“现代”

不同时期世界范围内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和变化。现代化的理想社会模式并非单一的，其进程和道路也不尽一致，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所处的历史现实环境不同，其所依赖的传统的现代化转化方式、条件也可能不同。关于“转型”学说很多，而且仍在不断的争论中获得发展。较近时期中国史学界中所重视的“转型(期)”研究，多与“现代化研究”关系密切，即受到美国学术的影响较多。即使如此，这一学说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追求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模式的局限，已被很多西方学者所质疑，如继其后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依附理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便已经取代了其地位，作为新兴学派的代表人沃勒斯坦等，把人类文明社会的模式概括由国家扩展到世界和国际体系，在这一理论的认识下，我们会发现造就“转型”的过程和因素远远超出了努力实现转型的“民族国家”本身。所以，对工业革命历史所带来的世界文明的现代性的认识仍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艰巨的研究命题。

此外，除了宏大的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转型，世界历史上还有很多的变革和变迁，被各自领域的历史学家称为“转型”。虽然，这些转型研究关注的命题规模较小，但也同样重视对中观社会模式的分析和概括，比如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唐宋转型”或“唐宋变革期”的有关归纳，对于加深中国传统社会内在变化机理的认识，助益尤大。近年来，不仅转型研究中注重社会模式的描摹，在对变革幅度较小的社会变迁的分析中，如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新理论的借鉴更为活跃，如人类文化学的引入，对不同地域、时期的各種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做类型学意义上的梳理与比较，同样在丰富着关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认识。

所以，世界史与中国史中的转型研究，既需要在考证、清理重大变革时期的史实的同时，还要继续关注、重视社会理论科学的发展，吸取各种社会科学发展中有价值的部分，提高对微观和宏观历史的认识。关注和研究“转型”，不仅体现了史学工作者关注现

实、重视研究重要变革时期的取向，也表现出了重视各种新的社会理论分析学说和工具的清醒、宝贵的意识。

湖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历史学专业创设已有 20 余年，近年来史学研究取得显著进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比如毕道村教授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及运用系统论重新构建的现代化理论分析模式，已有较大影响，可以说是本院转型研究的奠基人，另外徐煌教授致力于西欧社会早期研究，对社会、政治领域的转型研究非常深入，汪建武教授和高志平博士分别从世界古代文明和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对中国与世界的变革与互动进行长期的研究等；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研究也已经出现了基础雄厚的研究队伍，徐旭阳教授、张泰山博士、李建刚、李柏林等老师对于处于变革激荡的晚清至 1945 年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尤其是以湖北社会变迁的研究已经显现出了一定的特色和良好的基础；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审视上，刘玲娣、蔡明伦、刘建民和尚平四位博士分别在传统官僚政治及文化研究上已有所建树。目前这支研究队伍，不仅视野开阔，理论基础深厚，有锐意探索重要社会变革和转型阶段的发生机制与结构，努力进行转型理论的创新，同时又能够严谨治学、细致考证，并努力将不同重要时期的微观社会变迁研究与重大社会变革和转型的研究结合起来，已经显现出了科研的勃勃生机。可以说，本院的世界与中国重要变革期研究和转型研究已经初步呈现出自己的特色，相信在继续坚持史论结合、中西结合和古今结合的研究的特色上，会有更多创新性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从中产生。

汪建武

目 录

序言 (1)

社会转型理论与西方社会转型

历史学与现代化 (1)

社会转型研究的困境和希望 (11)

世纪之交与史学改革 (19)

游牧民族历史影响比较研究 (30)

试析中世纪西欧庄园制瓦解的经济影响 (43)

市场经济的孕育是西欧率先工业化的动因 (53)

论西欧生产奴隶的消亡

——东西方分手的岔口 (68)

论二战后亚非新兴国家外交转型的成因 (89)

20世纪8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 (105)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政治文化研究 (121)

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教育观念的变化 (130)

论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 (140)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转型

司马迁的社会变迁观念

——文字表现可能性限制下的叙述 (150)

略论司马迁天人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 (154)

论孙盛的老子观 (163)

试论胡安国两宋之际的政治和学术活动	(178)
南宋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的关系	(192)
宋代户帖的性质及其使用	(204)
明清之际思想家对“银荒”的议论及解决方案	(216)
论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227)
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	(244)

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

近代内地社会转型的成功范式

——对黄石早期现代化的个案分析	(254)
-----------------	-------

中国近代人口思想的启蒙

——汪士铎人口思想解构	(280)
-------------	-------

1875—1937 年大冶的矿业开发与近代化	(287)
------------------------	-------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	(304)
--------------	-------

近代农村社会转型中的沉重脚镣

——1927—1937 湖北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考察	(313)
--------------------------	-------

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结构及其素质考察

——以 1927—1937 年湖北为例	(328)
---------------------	-------

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之反帝态度	(343)
-----------------------	-------

抗日战争与鄂西后方国统区社会的变动	(350)
-------------------	-------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的公费教育制度	(357)
-----------------	-------

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	(380)
---------------------	-------

后记	(398)
----	-------

历史学与现代化

在今天，历史学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似乎像 80 岁的老妪和 20 岁的小伙子之间那样，了无姻缘。在人们的心目中，它最多也只能作为培养年青一代的爱国心和爱国情感的教材，在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有其一定的作用，在保护国学的呼声中因而也有它的一席之地，但是，对于物质文明建设来说，对于今天举国上下、全力而注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历史学似乎与其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什么用处。

事实是否如此呢？历史学对现代化究竟有没有用，这倒确是需要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事先宣称，历史学的地位和盛衰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命运。历史学在现代化中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还是让历史自己站出来说话为好。

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竭心尽智、奋勇拼搏，主义尽管不同，但目的无非一个：振我中华。为此，他们俨如一个医生，为积贫积弱的中华诊脉看病，提出了各种旨在振兴中华的方案和主义：魏源、龚自珍认为中国之所以败在西方的枪口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所以，他们给中国开的处方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等人诊断的结论是中国缺乏机器大工业，他们因此而选择了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医术无疑又技高一筹，他们说中国的贫弱，不仅在于中国没有近代军事工业和其他洋务，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力主变法；到了孙中山，认识更

进了一步,要想改革社会制度,就必须推翻卖国的清朝政府,因此,他号召人民“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实行三民主义;毛泽东的医术无疑是前无古人的,他深刻地指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

纵览、比较、研究这一连串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志士仁人提出的振兴中华的方案、主义都是以他们对中西历史进程的宏观考察为前提、为基础的。换言之,对欧美各国后来居上的原因的认识及由此而作出的中国衰弱不振的病因的推断是他们振兴中华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这些决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中国富强起来,就要取决于他们对中西历史的认识深度了。

不容否认,志士仁人们的方案和主义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西方后来居上和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正由于此,随着这些方案和主义的推行,中华民族也日渐富强起来。可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未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甚至在已取得了巨大胜利之后,还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走了不少的弯路,耽误了不少的时间。人民公社、大跃进、十年浩劫等这些发生在西方经济结构大调整、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的事件,使我们丧失了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大成就的时机,与发达国家之间本已缩短的差距又被拉开了。然而,这些又往往出于一种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的良好愿望。但遗憾的是,结局完全相反。其间缘由,显然是这些愿望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中国的国情。我们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方案和主义时,对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却知之甚少。我们不了解英伦三岛何以能从西欧的第三世界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故乡,更不清楚西欧在15世纪后后来居上的原因,现代化的动力是什么?它需要哪些条件,需要克服哪些障碍?没有掌握早发的、内生型的现代化,也就难以了解为它的规律所支配,但又交织了许多外来文明,因而具有很多特殊规律、表象更为复杂的后发的、外诱型的现代化。不了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规律和社会机制,不了解过渡的各种

类型及其特点,当然也就无法深入分析中国的国情,找出中国的特点,分辨出国情中有利于和不利于现代化进程的成分,以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捷径。这是因为,所谓深入分析中国国情,不仅应全盘掌握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更关键的是要对这些情况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性质、地位及所能起的作用作出鉴别,以利用其好的方面,而避免其坏的作用的发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参照系,否则,我们的结论就可能是一个谬误。例如中国史家普遍认为,土地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正是它导致了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和不断地改朝换代,因而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然而,当我们把西欧作为参照系后,就会发现土地买卖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城市兴起后的西欧也盛行土地买卖,它虽然也导致了土地兼并,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兴起和农业的近代化。这说明,土地进入市场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具有两重性,问题是怎样调控它投入流通时的条件和背景,以尽量使其朝好的方面发展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可见,有无正确的参照系,对国情的判断就截然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就大相径庭。

不了解现代化的规律、条件、各种特殊类型及其特殊规律、特殊条件,又没有全盘掌握和正确地判断中国国情,当然也就难以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难以制定出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国情的战略决策,而只能凭借军事上、政治上成功的历史经验进行经济上的试验,以致遭到了经济规律的报复,使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无法统一起来。

满腔热血,却壮志难酬,其间缘由,并非是志士仁人们对中西历史进程大相悬殊的原因和中国的国情全然不知,而是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他们并不了解西欧后来居上的全过程和深层次的根源,也未能透视到中国历史的深层底蕴,而只是以其所了解到的西

欧部分历史和中国的部分国情为基础来制订其方案的。决策基础的这一缺陷决定了这些决策远未达到优化的程度。因此，这些方案只能解决中国的部分问题，而不能使百病缠身的中国得到彻底的根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把他们觉察到的中国落后的部分原因当成全部原因、次要原因当成根本原因，以致将其解决前者的手段和成功的经验不加区别地用来处理他们所遇到的很多新问题，作为使中华振兴的基本方法时，就必然会引起与其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除了遭受原来的封建压迫外，又陆续增添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两座大山。这三座大山横亘在中国面前，确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发动人民，开展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来推翻三座大山实为必要。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三座大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障碍，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从而把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作为包医百病，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手段和最有效的办法，那就必然要出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人间悲剧。而悲剧之根源，就在于其导演的认识论上的失误。三座大山虽然是近代中国遭受一系列苦难的原因，但从中国历史的全局上看，它们并不是中国的现代化姗姗来迟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中国迟迟未能启动它的现代化，才有近代西方的入侵，才遭致了日本的欺凌，才使中国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产生了军阀割据、官僚资本这样的“怪胎”；同样的，也正是由于中国长期未能进至工业社会，直到近代，在其上面还压着封建主义这座大山。因此，要想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发达国家，问题就不仅仅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是要克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其他障碍，找到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国迟迟未能产生的深层次的根源。只有找到这个根源，找到由这个根源所派生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大山，我们才有可能制订出科学的决策，挖去这个根

源，排除各种障碍。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在不明了中西历史发展的全局和其由之出发的根基的情况下，将自己对历史的粗略认识当成真理的终极，把推翻三座大山的有效办法当做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并由此而去制订振兴中华的决策，那就势必事与愿违。所以，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志士仁人们振兴中华的各种方案的缺陷和失误有其深刻的认识论上的根源，这即是他们对中西历史进程及其大相悬殊的原因的了解尚待深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中西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人们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也须经历一个渐进的历程。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并不是全面地、系统地比较研究中西历史的结果，他们对西欧各国后来居上和中国由先进变落后的原因的了解尚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所得出的结论，在今天看来，离问题的解决尚有相当的距离，有的甚至是倒果为因，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如此一来，初衷就难以达到，失误就无法避免。

决策的正确程度首先取决于决策者对决策对象的认识，这并非仅限于现代化决策，而是一切决策都无法回避的法则。医生治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得最多的，也是这一法则表现得最清楚不过的一个例证。

与医生治病相比较，振兴中华的努力自然要复杂得多。将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强盛的现代化的中国，同样需要政治家们具备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术和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的深刻洞察。所谓高超的医术，即政治家们必须了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各种途径、规律、特点和所需要的条件等等；所谓对积贫积弱的病根的洞察，就是政治家们必须全盘掌握中国的国情。完全可以说，要想振兴中华，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然而，无论是了解前者，还是把握后者，最根本的途径只能是研究历史。

要了解现代化进程的规律、前提和条件，熟悉现代化的各种类型及其特殊性，认识它们各自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优胜劣弊，除了对